



龍鳳藝術

沈從之

龙 鳳 艺 术

沈 从 文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957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字数 77,000 开本 850×1168 纸 $\frac{1}{32}$ 印张 $3\frac{3}{4}$ 插页 15

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册) 00001—13,000册

題 記

这个小冊子，是我近十年在历史博物館工作写的文物論文一部分。我对于文物本来是个外行，也并不懂艺术，史部学底子又極差。只因为解决通史陈列，必需对于古文物各部門有一定理解，并且明白它和文献記載相互关系。特别是新出土万千种东西，个别和成組列的發現，或在某一新地区出土，究竟啓發了我們什么，丰富了我們什么，以及解决了我們什么问题，对于新的历史科学研究又有什么貢獻，明白得越深刻具体，陈列說明自然也就能够比較正确恰当，科学性思想性因而加强。又因为几年来經常协助国内美术工艺生产教学和文史研究工作提供參考資料，对某些工艺圖案，文物制度，其他方面工作同志不易接触的，我由于工作条件便利，又得到党领导的特別鼓励，和館中同志帮助，也作了些初步探索工作，因此写出了这些常識性小文章。虽然也企圖學習用新的观点方法，結合文献和文物，从發展和联系去求理解，作分析，提出个人見解，無如学識有限，見聞又窄，而且有些問題过去从来还少有人認真研究过（例如錦緞印染花紋历史，加工紙絹花紋历史），所以文章膚淺不全面外，不可免还会有許多錯誤，有待充实和改正。好在國內專家学人極多，工艺史問題，物質文化史問題，都还有许多空白点亟待填补，盼望由于我这个小書的不

足处，能够引起真正專家內行的注意和兴趣，写出更多更扎实好文章来。

解放十年来，国家面貌一新，六亿人民都共同生活在一种崭新关系中。在总路綫光輝照耀下，全国人民公社建立后，生产建設都以一个史無前例的大躍进速度向前發展，随着經濟建設高潮的来临，文化高潮也必然繼之出現。近十年我写的东西实在太少，做的工作也不够多，这个小書能够出版，既欣喜且深深慚愧，真近于古人說的野人献曝，东西不足道，意思却还好。如果对于一部分年青文物工作同志，能够稍稍有助于他們的新的历史文化科学的研究，也就不为害無意义了！

1959年12月

目 次

題記	1
鐵金錦	1
藤染纈	25
“明錦”題記	34
藤皮球花	41
湘西苗族藝術	46
塔戶剪紙	51
古代鏡子的藝術	56
龍鳳藝術	66
魚的藝術	74
藤破器藝術	80
藤金花紙	85
談談“文姬歸漢圖”	93
北京有許多博物館，同時又是個大型建築博物館	101
文史研究必須結合實物	106

織金錦

中国絲織物加金，从什么时候起始，到如今还是一个問題，沒有人注意过。比較正确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發現。以目下知識說來，如把它和同时期大量用金銀裝飾器物联系看，或在战国前后。因为这个时代，正是金銀錯器反映到兵器、車器和飲食种种用器的时代。是漆器上起始發現用金銀粉末繪飾时期。是用金槌成薄片上印龙紋作为衣上裝飾时期。但是文献上提及錦繡时，是和金銀联系不上的。春秋以来只說陈留襄邑出美錦、文錦、重錦、純錦，錦字得名也只說“和金等价”，不說加金。迄今为止，还没有發現过这时期墓葬中絲織物加金的記錄。长沙战国古墓中，得來些有細小花紋絲織物（新近还發現棺木上附着的黼繡被），可不見着金痕跡。陕西宝鸡县斗鷄台，發掘过西汉末坟墓，虽得到些鳥兽形薄金片，或是平脫漆上鑲嵌的东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裝飾。西北樓蘭及交河城廢墟中，掘出的小件絲繡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絲織物还極完整，不見剝損痕跡，当时是用金箔粘貼，还是泥金塗繪，又或只是其他东西上殘余金屑，不得而知。东汉以来，封建帝王亲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賜东园秘器，有用朱砂画云气的棺木、珠襦玉匣。这种玉匣照“后汉书輿服志”解釋，是把玉片如魚鱗重叠，用金銀絲縷穿綴起来裹在身上的。

一般圖錄中還沒有提起過這種實物式樣。歷史博物館中有份劉安意墓中出土遺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就可看出用金縷的方法，還是用細金絲把玉片釘固到絲織物上。當時這種金絲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決不會特別顯著。

“史記”、“漢書”都稱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歡喜錦繡。漢代以來中國每年必賜匈奴酋長許多錦繡。中國向大宛、樓蘭諸國換馬和玉，也用的是錦繡和其他絲織物。這種絲織物中，是有加金的，如“鹽鐵論”說的中等富人的服飾，即有“麗衣金縷，燕絳代黃”。說的金縷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來物。“晉書”“大秦國傳”，稱“大秦能刺金縷繡”。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歡喜錦和金銀，就有可能從大秦得到金縷繡。近半世紀西北發掘的文物，証實了史傳所稱西北民族愛好錦繡的習慣。外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漢代絲織物，如帶文字的“韓仁”錦，“長生無極”錦，“宜子孫”錦，“羣鵠”錦，“新神靈廣”錦，“長樂明光”錦，和不帶文字的若干種綾錦繡件，截至目下為止，還是中國古代絲織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貴的遺物。它的紋樣和古樂浪漢墓出土的絲織物大同小異，恰是漢代中原絲繡的標準紋樣。（正和“鹽鐵論”說起過的，兩地當時受中原墓葬影響情形相合。）中國科學院黃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羅布淖爾發掘報告”中說：“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塚中，死者衣文繡綵，甚為麗都，雖黃髮小兒，亦皆被服之。”（見報告第七十頁。）遺物中有一片近乎織成刻絲的織物，上面作的是一足球尾馬拉一輛車子，文獻和其他報告圖錄中，還從來沒有提起過。但似乎沒有見過刺金縷繡。其中一個青紅錦拼合成的錦囊，記

录上虽說是从魏晉之际古墓中得来，其实是正格汉式錦，一作龙紋，或即“西京雜記”所謂蛟龙錦，有無極字样。一作花紋对立小鸞，有一宜字，似宜子孙錦，已啓唐代作風。这些絲織物据朱桂莘先生說，当时或着金。但从提花緯綫考查，不像加过金。在北蒙古古坟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紅色有串枝花的毛織物。花紋和一般絲織物截然不同，和汉末鏡沿裝飾倒相近。如非当时西北著名的細罽，从花紋看，有可能来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国家，时代当在魏晉之际。（見“北方系文物研究”，第一六一頁后圖五十三。）

因“西域傳”記載，中国絲織物加金技术上的發展，一部分学人即以为实来自西方。（特別是帝国主义者学者这么說。）但是，一切生产都必然和原料發生联系。錦緞类特种絲織物生产，除古代的陈留襄邑，山东临淄，汉以来即应当数西蜀。金子生产于西南，汉代西蜀出的金銀釵漆器，在国内就首屈一指。因此，中国絲織物加金的技术，說它創始于西南，或比較还符合事实。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后来唐宋的明金縷金法，明、清的片金法。絲織物紋样既和同时金銀錯紋样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銀錯大同小異。

張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論，批評三国时絲織物說：“金薄蜀薄不佳，鮮卑亦不受。如意虎头連璧錦，来自洛邑，亦皆下惡，虛有其名。”循譯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織的金錦和綵錦，送給鮮卑民族，也不受欢迎。洛陽有名的出产，品質并不高。“諸葛亮文集”則称“蜀中軍需惟依賴錦”。可知当时蜀錦生产还是軍需主要来源。川蜀是金子重要生产地，搗金箔技术，于蜀中得到發展，是極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三国志”魏志“夏侯尚傳”称：“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將軍以下，皆得服綬、錦、罗、綺、紬、素、金銀縷飾之物。”說的即明指各种絲織物衣服上加金銀裝飾。或刺繡、或織成、則不得而知。（用金銀縷刺繡作政治上权威象征，从此一直在历史發展中繼續下来，到以后还越来越广泛。）

欢喜用金銀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陆劼著“鄴中記”，称石虎尚方錦署織錦种类極多，可沒有提过金錦。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諸名目，这种锦在汉墓中即已發現，还是韓仁錦类汉式錦。但这时节印度佛教大团花已見于石刻，反映于絲織物，很可能就有了后来唐代的晕錦类大花錦，宋时的大宝照錦，用虹彩法晕色套彩，技术上比韓仁錦已大有进步，可不一定加金。至于当时的織成，則近于宋以来刻絲。有几种明自称金縷和金薄，說明小件絲繡用金的事实。“鄴中記”又称，“石虎獵則穿金縷織成合欢袴”，可見当时也用到比較大件衣著上。所說金縷即唐宋的撚金，金薄即后来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說縷金，却有时指明金，有时指撚金。撚金又可分后来尅金式的和一般庫金用的。）

“西京雜記”也記了許多特別絲織物，曾說“蛟文万金錦”，这个著作說的虽是汉代故事，反映的却多是魏晋六朝时物質，蛟文万金似乎只是奇異貴重的形容，花紋正如西域所得錦緞，并非用金織就。

許多記載中，惟“蜀典”引曹丕批評，所說金薄蜀薄指的近于后来織金，且和曹操“上杂物疏”文中一再提起的“金銀參帶”漆器相关联。文中还提起許多漆器是用金銀繪画的。

另外东晋时也用泥金，王隐“晋书”称，江东赐在凉州的張駿以金印大袍。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光傳，說賜光金縷繡命服一襲。还是像撚金縷，不是織金。

就情形說來，織金法大致至迟在东汉已經使用。川蜀机織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作金銀釵漆器一样，当时实在具有全国性，既可得極高利潤，自然会繼續生产。

到三国时，由于中原長年战争影响到銷路，也必然影响到生产。这时生产技术虽保留，品質已退步，不如本来。至于用撚金刺繡和撚金法，技术上有可能是从西方傳來的。魚豢“魏略”即称大秦能織金縷繡。至于在中国和泥金塗画，三种加金同时用到，当在晋六朝之际。先以北方用它多些。原因除奢侈享乐，还有宗教迷信，諂媚土木偶像。（註：“洛陽伽藍記”提金銀着佛像極多。）不久南北同風，南方用于妇女衣裙，且特別显著。隋代用泥金銀即極多。到唐代，貞观时先还儉朴，及开元天宝之际，社会風气日变，一般器物多用金銀，或金銀裝飾，如漆器中的平脫鏡子，桌几，馬鞍，（姚汝能“安祿山事迹”还提到金銀鈎壺箴籬。）加之外来技术交流，一般金細工都有長足發展，从現存实物可以明白。絲織物加金技术，也必然于此时得到提高。撚金織于是同样得到發展机会。不过从唐人詩詞描述中看来，用于女子歌衫舞裙中的，还不外两种方法：一即鎔金法的泥金銀繪画或印花；一即撚金縷金片的織繡。以泥金銀繪和撚金刺繡具普遍性，織金范围还極窄。

“銀泥衫穩越娃裁”，“不見銀泥故衫时”，“罗衣隱約金泥画”，“罗裙拂地縷黄金”。即多用于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間或

用到男子身上。“鵷鵠集”称，“唐永寿中，敕賜岳牧金銀字袍。”又“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時，武后賜以紫袍龜帶，自制金字十二以旌其忠。”這可見男子特种衣袍上加金銀文字，從晉以來就是一種政治上權威象徵，不會隨便使用的。又“唐書”称“禁中有金烏錦袍二，元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記元宗賜安祿山衣物中，也有“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鷄袍”。指的都是當時特种統治身分才能用這種加金絲織物衣服。

又“唐語林”称，貴妃一人有繡工七百餘人。為了滿足當時楊家姐妹的奢侈極慾的享樂，衣褶中用金處必然極多。至於如何使用它？從敦煌唐代女子服裝注意，可以見出當時花朵的佈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裝小簇，即宋時金人說的“散答花”。串枝連理則多用於衣緣、斜領和披肩、勒帛。花式大都和現存唐鏡花式相通。（特別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綾，如雁啣綬帶、鵲啣瑞草、鶴啣方勝地黃交枝等等，反映到遺物和鏡文中，都極具體分明。）它的特征是設計即或用折枝散裝花鳥，要求的還是圖案效果。作法則刺繡和銷金銀具比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綵色夾縐印花絲織物上，再加泥金銀繪的。

“唐書肅宗紀”，“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繡”，正反映元宗時金泥刺繡必十分流行，經安史之亂後，才用法令加以禁止。但唐代特种絲織物，高級錦綉，一般生產我們却推想是不用織金，也不必用金的。衛端符記李衛公故物中有錦綾袍，陸龜蒙記所見云鶴古錦裙，說的都是唐代講究珍貴綵色綾錦，文字敘述非常詳細，均沒有提起錦上用金。兩種織物照記載分析，都近於後來刻絲。

日本正倉院收藏唐代綾錦許多種，就只著明有四种唐代特种加金絲織物。惟用金到衣服上，且确有織金，和許多不同方法加金，開元天寶間“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計共有如下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研金、披金、泥金、鏤金、捻金、戣金、圈金、貼金、嵌金、裏金。（此為明楊慎所引，今六典無。）

唐人記閭立本画，用泥銀打底，是和泥金一樣把金銀作成細粉敷上去的。若用于衣裾帳幔，大致不外是印花和画花。捻金是縷金再纏在絲綫上成綫，也可織，也可繡。一般說來，繡的技術上處理比較容易，用處也比較多。織金通常却用兩種方法：一則縷切金銀絲上机，是三国以來金薄法，唐宋明金法，明清片金法。一作捻金綫織，捻金法有可能從西域傳來。早可到三国時，由大秦來。晚則唐代由波斯通過西域高昌、龜茲諸地區兄弟民族，轉成中原織工技術。北宋末文獻紀錄已有捻金青紅錦五、六種。但直到明代，織金錦中用到捻金的，佔織金類比例分量還是極少。清代方大用，是因細捻金綫技術有了特別進步，才把這種捻金範圍擴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應數清華大學藏乾隆兩軸刻絲加金佛說法圖，徑幅大到一丈六尺以上。原藏熱河行宮，共十六幅，辛亥以後取回北京，存古物陳列所，日本投降後，不知為何被人偷出售于清華。還有一種細拉金絲織成的純金紗，明代已見于著錄，北大博物館曾藏一背心，似清代剪改旧料作成。）

唐代宗時禁令中稱：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大欄錦、蜀鑿錦（即鑿六破錦，龜子紋發展而成的）、獨窠、連窠、文長四尺幅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及常行文字綾錦，及花紋中盤龍、對鳳、麒麟、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万字、双胜，均宜

禁斷。

禁斷諸綾錦名目，如瑞錦、大欄、麒麟等錦，有一部分還可從正倉院藏綾錦中發現。這些錦樣的設計，多出於唐初寶師繪。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說得極清楚：

寶師繪，官益州大行台，兼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繪，至今傳之。（流行九十年）

張彥遠見多識廣，筆下極有分寸，說的章彩奇麗，必然是在講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華麗。這些錦樣真實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從正倉院藏琵琶錦袋（似織成錦），和時代雖晚至北宋，花式尚從唐代傳來的紫鸞鵲譜刻絲（在纂組英華彩印過），內容我們還可彷彿得到一二。這種華麗色調，在宋錦中已有了變化發展，但反映於這片刻絲，還十分動人。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們也還可以從同時流行反映於敦煌洞窟天井牆壁間經畫團窠方勝諸錦紋，及銅鏡、金銀器上的花紋圖案，得到唐代絲織物花紋基本特徵。

因此我們明白，唐代絲織物工藝上的重要貢獻，還是以花紋色調組合為主，即部分加金，也是從增加裝飾效果出發，如正倉院藏加金錦，和元明以來之納石失，遍地金，庫金，尅金，以撚金或片金為主要的絲織物，是截然不同的。

絲織物加金有了進一步發展，大致是在唐末五代之際。絲織物花紋由圖案式的布列，發展為寫生折枝，也是這個時期。其時中原區域連年兵亂，已破敗不堪。前後割據於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吳越的錢俶，政治上還能穩定，聚斂積蓄日多，中原畫家和第一流技術工人，能逃亡的大致多向這些地

方逃去。几个封建统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边又各有一羣官僚文人附庸風雅，金銀一部分用于建筑裝飾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糜費于妇女彩飾衣褶中。几个地方又是絲織物生产地，織繡工和当时花鳥繪画發生新的联系，大致也是在这个时期。惟关于这个时代的絲織物，除詩詞反映，实在造物反不如唐代具体。（仅近年热河辽駙馬墓出一件燃金織，云鳳类大袍或被面。）詩詞中叙女子服飾用金極普遍。在瓷器上加金銀邊緣裝飾，也是这个时代，从吳越創始各种“金銀稜器”。

到宋統一諸国时，从西蜀吳越得來錦緞数百万疋，除部分犒軍耗費，大部分是不动用的。北宋初年，宮庭儉朴和社会風俗淳厚，都極著名。旧有的还不大用，新生产也不会在这个時間特別發展。直到眞宗时，社会風气才有了变化。由于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权制，一面是从諸国投降得來無數金銀宝貨，一面是从各州府財政收入統屬中央，且集中京師，就有了个可以奢侈浪費的物質基础。其时正和佔据北方的契丹結盟議和，权臣王曾丁謂輩，賈諛爭寵，企圖用宗教迷信結合政治，內騙人民，外哄契丹，因之宮中忽有天書出現，隨即勞役数十万人民，修建玉清昭应宮，存放天書。把全国最好的工人，最精美的材料，都集中汴梁，来进行这种土木兴建工程。并集天下有名画師，用分队比賽方法，日夜赶工作壁画。一千多間房子的工程全部完成时，君臣还儼然慎重其事，把天書送到庙里去，大大的犒賞了参加这个工程的官吏和工人一番，絲織物用金的風气，也因之具有增加。

宋王栐著“燕翼詒謀录”，記述这个用金風气的發展，便認為突起于粉飾太平，上行下效，不仅士大夫家奢侈，市井間也

以华美相胜。用金情形，則可从反复禁令中充分反映出来。其实，当时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例如：汴梁城中二十余酒楼，特别著名的樊楼，楼上待客用的大小金银器具，就有二万件。三两个人吃喝，摆在桌面的银器也过百两。即小酒摊吃过路酒的，也必用银碗。大中祥符八年诏令，提起衣服用金事，名目即有十八种之多。計有銷金、鑲金、間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綫……

除部分是用于直接机織，其余大都和刺繡、印画、纏裹相关，即从用金方法上看，也可以想見这个中世紀統治階級，是在如何逐漸腐敗墮落，此后花石綱的轉運花石，壽山艮嶽的修造，都是从这个風气下發展而来的。

不过，現存宋錦或宋式錦，都很少見有加金的。說宋錦加金，且和一般習慣印象不相合。这有两个原因作成：一、照習慣，鑑賞家对于錦类知識，除从“輟耕录”、“格古要論”、“博物要覽”諸書，知道一些名目，居多只是把画卷上引首錦特别精美的龟子紋，盤螭瑣子紋，八达量等几何紋式綵錦，就叫做宋錦。即名目也并不具体清楚明白。因此不聞宋錦有織金。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写生折枝，这些花也反映到錦的生产中，打破唐以来的習慣。这种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明代把这种綵色花錦，斜紋織繆絲地叫“錦”，平織光地的叫“緞”，福建漳州織薄錦叫“改机”（宏治間織工林宏發明），凡彩色平織，帶金的叫做“粧花緞”或“織金緞”，不作为錦。因此，即遇到这种宋錦或宋式錦，也大都忽略过了。其实宋錦和社会上的一般認識，是不大相合的。折枝写生花部分加金和全

面用金，在宋錦中是不少的。文獻中提起的近百種錦名，大部分還可從明錦中發現。

宋錦加金至少有兩種方法，我們已經知道。一即古代之金薄法，宋代稱為明金。“洛陽花木記”稱牡丹中有“蹙金毯”，以為色類“間金”而叶抄皺蹙，間有黃綾斷，續於其間，因此得名。又記“蹙金縷子”，情形也相差不多。宋人歡喜把本色花鳥反映到各種工藝品上去，若反映於絲織物上時，自然即和建築中的彩繪勾金，及現在所見織金粧花緞用金情形大体相合。宋錦中是有這種格式的。加金有多少不同，在宋人通呼為“明金”。記載這種絲織物名目，花紋和用處較詳的，以“大金集禮”提起的比較多而具體。說的雖是南宋時女真人官服，我們却因此明白許多問題。因為這種服制花式，大多是抄襲遼和宋代的。也有撚金錦，如明清撚金或庫金。文獻上提起撚金錦的，多在南北宋之際。“大金弔伐錄”記靖康圍城時，宋政府和金禮物中即有金錦一百五十疋。周必大“親征錄”，稱南宋使金禮物中，即有撚金絲織物二百疋。周輝“清波雜志”卷六，載給北使禮物，也提起過青紅撚金錦二百疋。又周密記南宋初年趙構（高宗）到張浚家中時，張是當時有四萬頃田著名大地主，獻錦數百疋，其中也有撚金錦五十疋。可知這種撚金錦在當時實在是有代表性的高級絲織物。同時也說明這種金錦，至遲在北宋中叶已能生產，但始終不會太多。“大金集禮”又叫作“撚金番縠”，說明從金人眼目中它既不是中國織法，也不是金人所能織，顯然是西域金綺織工作的。又叫作撚金綺，和錦的區別或在他的織法上。關於這種織工，南宋初洪皓著“松漠紀聞”，說得極詳細。